

清末杭州文化名人谭献

罗仲鼎

摘要: 文章以第一手资料,介绍清末杭州文化名人谭献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文化成就,尤其是词学创作及理论评述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及在词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复堂类集; 立功立言; 常州词派

作者简介: 罗仲鼎,男,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1)05-0107-04

谭献是清代同光年间负有盛名的文学家、诗人,尤以词学贡献最为突出。他是常州词派的殿后人物,被尊为“一代宗师”,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谭献原名廷献(一作献纶),字涤生,后改字仲修,号复堂,晚年自号半厂居士,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享年七十。

谭献生活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并逐渐走向没落崩溃的时期。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翻开了耻辱的一页。这一年谭献八岁。不久以后,也就是一八五一年的春天,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久的农民起义运动。二十余年间,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谭献的整个青壮年时代,都是伴随着充满战争与杀戮的黑暗社会度过的,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沉痛地写道:“余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鲜民之痛,不死于穷饿,不没于贼(指太平天国战乱),不溺于海,幸耳幸耳!”

谭献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士人家庭,父母早逝,是由祖母陈太宜人抚养长大的。由于家境贫寒,“无从师之束修”,几乎中途废学,后来倚靠父辈朋友的帮助,“招予读书其家,饮食教诲之”,才得以完成学业。他深知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刻苦自砺,奋发上进,才能逐渐显露,为前辈学人所赏识。“十五岁,就宗文义塾读书,补弟子员。十六岁乃为童子师。”不过当时私塾老师收入相当微薄,“岁修脯不及三十缗”,不足以养家活口,只能依靠他的祖母替别人做针线补贴家用,谭献晚年追叙道“尝力竭寒夜操作,龟手流血,予啜泣于旁。汝祖母训予曰:但汝得成立,读书识道理,无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这种境况,极大地刺

痛了年轻谭献的心灵,同时也激励他加倍地奋发向上。从此谭献开始认真“读有用书”,研究各种学问,从事诗词写作,并且广交各方朋友,为以后的入仕用世做好准备。但是谭献的仕进之途却十分坎坷。太平军起事那年,谭献十九岁,腐败的清军绿营兵不堪一击,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重镇,不久建都南京,而谭献的故乡杭州于咸丰十年(1860)和咸丰十一年(1861)两度被太平军攻陷,史载当时屠戮惨烈,他的祖母陈太宜人也在破城后“殉难”。此时谭献正避地福建,为学使徐树藩幕僚,他的妻子从家乡浮海来到,并带来了祖母不幸遇难的消息。谭献痛不欲生,说“呜呼,吾自此不得为人子,遂不足为人,已绝于天,死于心也已!”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军收复杭州,谭献历尽千辛万苦,携眷回到家乡,这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万念俱灰。时任杭州太守的全椒人薛时雨与谭献是旧识,对谭的才能非常欣赏,鼓励他继续应举。但是事与愿违,接踵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秋闹报罢”。同治丙寅(1866),马新贻任浙江巡抚,重视战乱后的文化重建,开办诂经精舍书院与刻书局,谭献被聘为总校,并参与编纂《忠义录》。同治六年(1867),谭献终于考取举人,此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以后他又多次入京参加会试,但不幸又一次次“下第南还”。谭献最后一次参加会试失败,是在同治甲戌(1874),这年他已经四十三岁,“自顾渐老”,决定放弃应举。可能是为了家庭生计,同时也心有不甘,“欲以民事自试”,稍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便向亲朋告贷,入赘到安徽担任地方官员,并于同治十三年(1874)岁末到达安庆,先在巡抚衙门做了一年多的幕僚,后于光绪丁丑(1877)年八月,出任歙县县令,己卯(1879)七月,调全椒令,辛巳(1881)九月奉命代理怀宁令,三年后移治合肥,两年后又调宿松县令,这年谭献已经五十四岁了。一年以后

他因病辞官归里,但是,回到故乡以后却“无以为家,赁庑转徙,不遑安处”,无奈只得“拟再赴含山令”。不料就在赴任途中,突然疾病发作,于是只好再次“具牍请开缺”,辞官回到杭州。光绪庚寅(1890),谭献往日的座主,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都会江夏(今武汉市)开办经心书院,聘请谭献担任书院院长,年近六十的谭献欣然赴命。在担任书院院长期间,他得以会见许多老友,结交新朋,培养了一批新才,还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和诗词创作,衣食无忧,学术有成,心情非常愉快。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愉快过于人世荣遇”。不过,衰年多病,独客他乡,终非长久之计。两年以后,他终于举家回到故乡杭州,与一批老友徜徉湖山,吟诗作赋,研讨学术,整理旧稿,直至七十岁去世。

中国古代向有“三不朽”之说,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千百年来士人们孜孜追求的理想。立德尚已,“唯圣人能为”,一般人只可仰望。其次是立功,自从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以来,遂成为众多士人追逐的主要目标,应试一入仕一经世致用,是士人们最现实的人生追求。然而这是一条崎岖险峻的道路,且不论入仕以后的宦海风波,即便要通过这条畏途,也总是成功者寥寥,失败者多多。这种情况堆积起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恒常的主题——怀才不遇。千百年来,绵绵不绝。谭献晚年曾作《亡友传》和《七友传》,传主都是他的同学、同乡,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屡北、穷途落魄的贫寒之士,虽然才能杰出,但是由于“无门户以招致,无缟紵以结欢”,他们之中或死于穷饿,或死于战乱,或坎坷以终生,或悒郁而夭折,其中包括庄棫、龚公襄、蒋坦这样的优秀学者文人。作者通过这些文章,除哀悼友人的不幸命运之外,也对当时扼杀人才的黑暗社会提出了悲愤的控诉。与亡友们相比较,谭献还是相对幸运的,虽然同样的怀才不遇,同样的命运坎坷,他至少还获取了举人的资格,出任过十多年的地方官员,并且数度受聘为书院和书局的院长或总监。他享有高寿,晚年俨然文坛领袖,宏农学派山斗,不仅在生前编辑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复堂类集》,选本《篋中词》,还能为已经亡故的师友整理遗稿,撰写序言,刻印面世,庶使其不至埋没于蒿莱。不过对于志存高远的谭献而言,内心依旧充满遗憾,他晚年感叹道“入赘以县尹官皖,非素心也”,又说“憔悴一第,既无期望之人,尘土一官,何与显扬之志?”显然,谭献对自己的仕进立功成就,是非常不满意的。

二

也许正是谭献“立功”的失败和遗憾,促使他在

“立言以垂世”方面更加奋发努力。有清一代,学术研究风气极盛,由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为学术文化的重镇,自明末清初以来,接连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师和文坛领袖人物。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谭献青年时代就在准备应举的同时,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终其一生。据胡念修说“先生自咸丰庚申(1860)以后,历劫乱离,家无长物。薄宦廿年,廉泉湛然,而聚书独数万卷,世推善本。读书亦如之,丹铅寒暑不去手。著书称是,积几以数尺计。”他的友人王麟书也有句云“少岁才名倾万里,才过四十鬓如霜。”足见其对学术研究的专注与痴迷。我们从现存《复堂日记》大量读书论艺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谭献学术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治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从传统儒家的经典入手,以小学为根柢,旁及史学、哲学、金石书法、版本目录,甚至还涉及政治、经济等等,他的论文《衢言》就对大乱之后朝廷图谋恢复的政治经济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建议。谭献“精研丙部”,尤其对《淮南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两书,“致力为最深”,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平。胡念修认为“其中鉴别独得之处,直发千余年来读者未泄之秘”,甚至超越了全祖望的《水经注校》与戴望的《管子校正》。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论。不过谭献自己对这两部投注了毕生心血的著作确实也十分珍视,晚年曾感叹道“吾老矣,恐不获亲见二书刊成行世矣!”透露出深深的悲哀和无奈。此话也不幸而言中,这两种著作在作者生前均未能“刊成行世”,前者则已被深埋于历史的积尘之下,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损失。

谭献生前曾多次刊印自己的诗文集。二十岁时就与友人一起刊印了《化书堂集》,咸丰九年(1859),时正当战乱,他还不到三十岁,在福建学使徐树藩衙门担任幕僚,又刊印了《复堂诗》三卷,《复堂词》一卷,不久“纂录本朝人所著,成《篋中词》五卷,《续》一卷刻行”,光绪己酉(1885),“乃自定《复堂类集》,凡文四卷、诗九卷、词二卷,付杭州书局刻之。”尽管如此,据谭献弟子胡念修说,他的著述“已刊者十不逮一二”,真可谓是著作等身了。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谭献对于“立言”的重视。

《复堂类集》共收录文四卷,晚年又自定《复堂文续》五卷,篇幅更多于《类集》,可惜《文续》“刻甫过半,先生已归道山。”不能不说这又是一大遗憾。复堂的文章涉及面很广,内容比较庞杂,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模拟汉赋的作品,如《明堂赋》上下篇,内容和形式都无甚创新,徒然堆砌辞藻典故,

与枚、马相较，恐不免邯郸学步之讥。至于模仿六朝骈赋的作品，如《临安怀古赋》、《定香亭赋》等，大体辞过于情，独创之意不多，正如作者晚年自己所批评的“从骈俪入，不能摆落华藻，无所谓洁静精微也。”与他钦佩的前辈作家汪容甫、龚定庵相比，恐怕尚隔一尘。第二类是碑传，内容主要涉及颂扬循吏的政绩，善人的义举以及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殉难官员的“壮烈”精神，例如《类集》中的《浙江忠义祠碑铭》、《朱联华传》、《厦门义学记》、《全椒崇善堂记》以及《文续》中的《许府君家传》、《戴文节公墓表》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其中有些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内容丰富，描写生动，作为历史文献，也可供现代研究者参考。第三类可称为单篇的学术论文和札记，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字、音韵、训诂、戏剧、碑帖、版本、目录等方方面面，时有真知灼见，但由于都不成系统，仅可供后人参考。他晚年自我批评说“吾所学最杂，六经不能上口，诸家师说涉猎及之，辄敢侈谈，此过失之大者。”这一段自白说明谭献不乏自知之明，作为一个学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然由于他的多数学术著作都未能面世，仅凭散见于文集的单篇论文来评价其学术贡献，是不全面也是不公正的。在同辈学人中，谭献年寿较高，位望较隆，他又数度参与刻书局工作，所以在《类集》尤其在《文续》中，保留了大量前人、友人诗文集的序跋，包括他自己所作的论古诗、唐诗、金元诗、明诗以及当代诗歌的文章，为后人研究谭献的生平思想、艺术主张和文学创作道路，以至清代晚期的文坛状况、社会文艺思潮，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复堂文章中的第四类，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类作品。谭献晚年解释为何自号“半厂居士”时说“予戊子（1888）以来，自号半厂，以为问学游迹，仕官文辞，率止于半，以识内愧。”满含着愧憾之情。在《复堂类集自叙》中，他也曾引用陆游的诗表达这种遗憾心情说“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前辈不生吾辈老，恐留遗憾又千年。”平心而论，谭献的仕宦学术，也就是“立功”的全部和“立言”的某些部分，确实不算成功，留有許多遗憾，但作为一位诗人、词人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文学史上，尤其在近代词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许是作者自己始料所不及的。

三

韩愈诗《和席八十二韵》有两句说“多情杯酒伴，余事作诗人。”欧阳修解释说“尝以诗为文章末事。”这种解释可能是片面的。但是后来正统儒家士大都赞成欧公的说法，认为与文章相比，诗歌只是“余

事”，词则是诗余，更加等而下之。谭献的观点与此相反。他恪守传统儒家的诗教理论，强调诗歌的重要社会地位和教化作用，在《明诗》篇中引用章学诚的话说：“诗教至广，其用至多。”又说“一代政教，一时风尚，皆可以观焉。”他评论诗歌优劣的美学标准是“托体比兴，推本性情，规矩雅颂，”他认为诗歌最本质的特点乃是“根柢乎王政，端绪乎人心，章句纂组，盖其末也。”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谭献对诗歌创作倾注了极大心血，他从十五岁开始写诗，三十岁以前就两次刊印诗集，直至晚年，从不间断。《复堂类集》共录诗十一卷，加上后人收集的《诗续》，总数在千首左右。与此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古典诗歌的普及推广，先后编选过《古诗录》、《唐诗录》、《金元诗录》、《明诗录》，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可惜这些选本都没能流传下来。对于宋诗，他是鄙视的，说“宋诗弃陋，言之不文，”相反对明代复古派却大加称赞“北地李梦阳，质有其文，始终条理，亦足当少陵之史矣。”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反映了谭献诗学思想保守的一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加深，作者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合肥三家诗序》中说“诗也者，贤人君子不得已而作也，希古乐道与夫观时感物，如笙磬之同音也。”在《春晖草堂诗序》中又说：“有天宝诗人忧生念乱之遗韵，《离骚》以降，所谓穷而后工者，其在斯乎？”认为诗人不必局限于“希古乐道”的温柔敦厚之旨，同时也可“观时感物”，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进而承认“忧生念乱，穷而后工”是屈原、杜甫以来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这一点，从谭献本人的诗歌作品中也可见出。谭献早期的诗歌，模拟古人的痕迹比较明显，缺乏鲜明的个性。中年以后身经战乱，饱尝流离颠沛之苦，感受亲友别离夭亡之痛，目睹黎民生活之艰辛，诗风为之大变。正如他的好友吴怀珍《复堂诗叙》所说“夫风会所极，诗道亟变，工拙盖殊焉。而原贤人君子所以作诗之旨，盖必有天地民物之故，与夫伦类身世升沉新故之感，一旦有触于外而动于中，遂以宣其缠绵悱恻，烦冤咄咄，不能自己之词，故优柔善入，惻然动人，使人歌呼悲谕而无以自主，盖其发于性情之正，有声诗以来，未有能有易此者也。”庄中白在《复堂类集后叙》中也说“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见其所长，而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触物有怀，盖风人之旨也。”同时指出了谭献后期诗风变化的原因及其诗歌的主要思想艺术特点。

与谭献的诗歌创作相比较，他在词学研究和创作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似乎更加突出，更为时人所看重，对后代的影响也更大。谭献与好友庄棫同为清代同光年间两大词人，陈廷焯评论说“余尝谓近时词人庄中白

尚矣，蔑以加矣，次则谭仲修，鹿潭虽工词，尚未升风骚之堂也。”庄中白早逝，谭献遂成为一时的词坛盟主。这一地位的建立，并非偶然，与他的词学主张、创作成就以及晚年在文坛的位望，都有密切关系。谭献认为，词不仅仅是诗余，更是古乐府之余，其源头上接四始六艺，风雅比兴，它由《小雅》发展演变而来。与诗相比，词还有自身独特的长处，“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因而在谭献看来，词不但不是士人不屑为的小道，而与诗文同样，可以是“立言以垂不朽”的事业。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填词，并对唐宋以来以至当代词人、词作及其发展源流变化，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年以后，他接受了常州词派的理论观点，“乃尊信张皋文、周保绪先正之言，锐意为之。”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谭献逐步掌握了诗词艺术各自的不同规律，“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从而使自己的倚声之作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占据了当代词坛的上游。谭献并没有像陈廷焯和况周颐等人那样，有专门的词学理论著作，为了宣扬和贯彻自己的词学理论主张，他选录清人词近千首，加以评点，此书命名为《篋中词》，在谭献生前刻行。由于“收罗富有，议论正大，”（吴梅语）弃取公允，品评精当，加上选评者在词坛的权威地位，遂为时人所重，“学者奉为圭臬”（龙榆生语），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他还与当时著名词人冯煦共同商榷，选定唐宋元明词三百四十余人，共录词一千零四十七首，名为《复堂词录》。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在作者生前及身后均未能刊行，仅有抄本留世，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据云亦已残缺不全。幸亏谭献入室弟子徐珂已把其中重要评论，录入《复堂词话》，使后人得以窥见《复堂词录》的部分面貌。作为“立言”的一部分，谭献的词学成就之所以超过其诗文，还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清代被文学史家称为词学复兴的时代，倚声之学在士人中非常普及，几乎达到人各有词、词各有集的程度。在有清二百七十多年中，词人数量之众多、词作风格之多样、词派面目之纷繁，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虽然清词的总体成就比不上

两宋，但是由于士人的大量参与，词进一步向文人化的方向演变，词的社会地位和美学品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加之自从词的曲谱失传以后，词丧失了它的音乐功能，已经不再是酒筵歌席上供伶人歌伎们演唱的歌曲，而成为了供文人写作的一种特殊的诗体。所以浙派衰落，以张惠言、周济等人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继起，大力鼓吹词并非“小道”，也非“诗之余”，而是“风骚乐府之遗”，完全可以“言志缘情”，像诗歌一样表现堂堂正正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而且由于格律的特殊性，词作为诗的一种补充，还可以表达某些在诗中不宜表达或难以表达的内容，更适合于运用比兴寄托的抒情方式，来表现词人某种幽深曲折的情志，“低回要眇以言其致，”以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谭献在《篋中词》中对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说“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就是这种词学观的表现，而张惠言的这五首词确实也达到了文人词的极致，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境界。清代自嘉、道以还，浙派式微，常派兴起，笼罩词坛达百年之久，除词学发展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社会的因素。清王朝在经历了康、雍、乾的全盛时期以后，封建社会母体所具有的一切弊端开始充分显露，这座大厦离完全崩坍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根基已经朽坏，一遇风雨就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动荡的社会呼唤文艺的变革。常州词派正是应时而生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打着反对“雕琢曼词”的旗号，主张词首先要“重意”，继承风骚乐府的优良传统，讲究比兴寄托，抒写“贤人君子幽约怨排之情”。虽然这种主张仅仅是封建社会内部某些士人试图补弊纠偏，进行改良的主张，与当时天崩地坼、血雨腥风的社会形势并不相称。不过对于荡涤当时词坛的不良风气，毕竟还是起过作用的。谭献作为常州词派的殿后人物，继承并发展了常派的理论主张，以自己的创作示范，精到评论，影响当代及后学，遂成为一代词学宗师。谭献“立言”的成就，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远高于其诗文创作，原因即在于此。正如近人叶恭绰先生所言“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始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